

徐志摩与帝师庄士敦

——以庄氏收藏中的《猛虎集》签名本为端绪——

关 光 世

提 要

本文以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SOAS）庄氏收藏中的一本《猛虎集》签名本为端绪，通过相关史料佐证，追踪寻觅徐志摩（1897-1931）与帝师庄士敦（1874-1938）两位历史人物的交往痕迹，并对此做出了尽可能详尽的描写。

据该学院纪录，该《猛虎集》上有徐志摩的签名。笔者在伦敦大学考察庄氏收藏，更注意到《猛虎集》上徐志摩的献词。其词暗示二人有长期的，较为密切的往来。徐志摩与哈代（1840-1928），傅来义（1866-1934）等西方文人的交往广为人知。我们注意到尽管徐志摩留学欧洲回中国后与庄士敦等西方人士交流合作，对西方文化影响中国发挥过重大影响，但是这方面所涉资料却寥寥无几，是以往研究很少涉及与挖掘的。

本文以《猛虎集》签名本的献词和日期等信息为线索，参照庄氏收藏中其他中国文人的书藉，也参照庄士敦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徐志摩日记以及往来书信等有关资料，阐述徐志摩和庄士敦交往的史实。

本文在该领域研究上较之以往的主要进展如下：

1. 推定他们的结识大概在于1922年冬天即徐志摩留学回国后不久。1924年泰戈尔（1861-1941）到华访问为二人合作的良好机会。当时徐志摩承担陪同翻译等工作，遇到不少困难，而庄士敦促成溥仪接见泰戈尔，庄士敦和徐志摩的友谊也进一步加深。
2. 胡适从他们的相识到合作过程中大概起到中间人的作用。
3. 我们认为泰戈尔访华以后，徐志摩与庄士敦的友情没有中断。通过围绕《贺双卿雪压轩集》的探索，我们推定徐志摩，胡适和庄士敦的中国人朋友圈很大程度上的重合。
4. 由于献词所用词语和当时的社会情势等原因，我们可以推定，1931年，徐志摩是亲手将《猛虎集》交给庄士敦的，我们还可以大致指定他们最后会面的日期与地点。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徐志摩与庄士敦不只有一面之交，他们的友谊始于徐志摩留学回国后不久，之后至1931年徐志摩遇难身亡前二人在特别抽空见最后一面，二人的往来源源不断地持续了十年。

本文首次详细介绍庄氏收藏中的庄士敦与徐志摩，胡适等中国文人的交往资料，并对以往几乎没有提到的徐志摩与庄士敦二人交往的起点，终点及其过程做出了详尽的阐述。这不仅对徐志摩的西方文化理解增添新资料，同时也可以对上世纪二十年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势分析提供有力的证明。

关键词：庄氏收藏，徐志摩，庄士敦，《猛虎集》，中西文化交流

引 言

徐志摩（1897.1.15-1931.11.19），浙江海宁人，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留学英美，深度理解和接受西方文化，回国后翻译多数西方诗歌和小说，还担任《新月》等刊物的编辑，是才华横溢的新

月派诗人，也是优秀的翻译家和编辑，为促进中国人理解和接受西方的文化思想做出贡献。1931年11月19日，因飞机失事而遇难身亡。

庄士敦(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1874-1938)，苏格兰人，是闻名于世的汉学家。他在香港，北京，威海等地共度了三十多个春秋，其间1919年到1924年被聘为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帝师。庄士敦回国后所著《紫禁城的黄昏》(1934)首次向欧洲人介绍中国皇宫里的故事，轰动一时。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略称SOAS)收藏着他的捐赠，号称Johnston Collection(庄氏收藏)。经过整理已知该Collection里有不少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语言文学领域的书刊，其中部分资料能够证实庄士敦与胡适、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等中国文人的来往。

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徐志摩的签名本。以往有不少资料谈到他与哈代(1840-1928)、傅来义(1866-1934)等西方文人的交往。但是，至于徐志摩与庄士敦的交流合作，所涉资料却寥寥无几，是以往研究很少涉及与挖掘的。徐志摩签名本的存在能够说明他们之间有较为密切的往来，而这一点还鲜为人知。因此对这段史实的追踪描写，不仅对二人的具体交往增添新资料，同时也可以对二十年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势分析提供有力的证明。

本文拟以庄氏收藏中的一本徐志摩签名的《猛虎集》为端绪，以庄士敦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徐志摩日记以及往来书信等史料为线索，追踪寻觅徐志摩与帝师庄士敦两位历史人物的交往痕迹。本文涉及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到华的历史事件，因为这有可能是徐志摩与庄士敦从一面之交到进一步加深关系的契机。

1 庄氏收藏

1.1 庄氏收藏中的几位中国文人

庄士敦1930年回到英国，从1931年到1937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略称为SOS)即现在的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的前身任中文系教授。他本期待这职位给他增添荣耀，也带来从事研究与写作的时间。但事实上并不理想，教学工作让他感到厌烦，被他称为“苦力活”(Coolie work)¹⁾。1937年9月末他辞职回到家乡苏格兰隐居，而后不到半年因病去世。根据他的遗嘱，他未公开发表的书信等文件都要销毁。庄士敦的遗嘱执行人将16,000件收藏物都捐给了SOS，其中包括一般所知的，他1930年离别北京时溥仪赠送的折扇和书画等国宝级的珍品，另外还有佛教、文学、地理、艺术等各方面的书籍和刊物，其上都附有庄士敦“樂淨山齋”的藏书票。这中间我们搜集到的中国文学家胡适、徐志摩、吴宓等的书籍共10本。与徐志摩有关的书籍6本：

(1)《翡冷翠的一夜》新月书店，1928年5月再版本

- (2) 《巴黎的鳞爪》新月书店，1930 年版
- (3) 《志摩的诗》新月书店，1930 年 再版本
- (4) 《猛虎集》新月书店，1931 年 初版本
- (5) 《诗刊》上海新月书店，创刊号（1931 年 1 月），第二期（同年 4 月），第三期（同年 10 月）
- (6) 《贺双卿雪压轩集》张寿林校辑，北京文化学社，1927 年初版本

以上书刊中，(1)《猛虎集》和(6)《贺双卿雪压轩集》扉页上都有徐志摩的字迹。《猛虎集》上的为“俚词一卷呈 志道先生惠存 徐志摩 北平 二十年秋”（见图 1）。而《贺双卿雪压轩集》上的则为“惠来先生 志摩”（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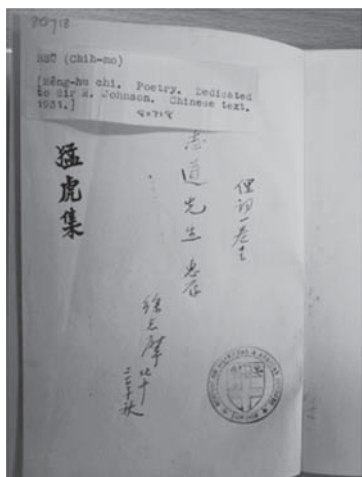


图 1 《猛虎集》上徐志摩的签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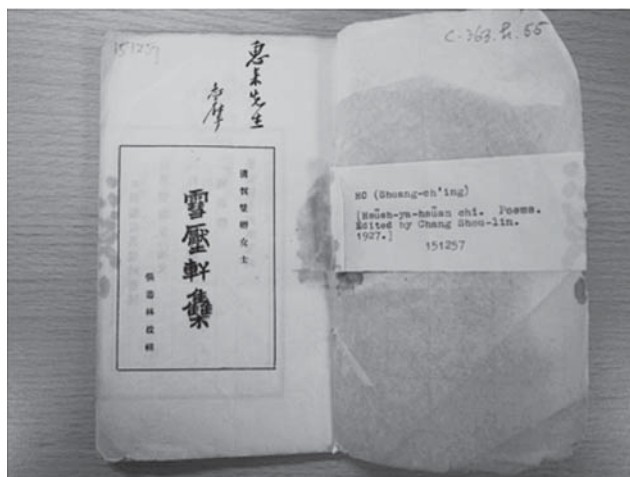


图 2 《贺双卿雪压轩集》上徐志摩的签名

以上照片均在得到 SOAS 图书馆允许后拍照的。

“志道先生”是庄士敦给自己起的雅号，“二十年”应该是民国 20 年即 1931 年，而《猛虎集》是同年 8 月由新月书店出版的。可见徐志摩与庄士敦的“一面”很有可能发生在该书被出版后到他因一场飞机事故而死于非命的将近三个月之间。他们是否只有一面之交，究竟有何往来？

以下书藉也都有作家签名：

- (7) 《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有胡适签名：“To My friend R. F. Johnston With Compliments, Hu Shih”
- (8) 《西遊記考證》有胡适签名：“敬呈 莊士敦先生 適”
- (9) 《吳敬梓年譜》有胡适签名：“敬呈 莊士敦先生 適”
- (10) 《吳宓詩集》初版本，有吴宓签名：“‘One of the truest & dearest friends of China’”

With best regards, Mi Wu 莊士敦先生賜政 吳宓敬贈”

1.2 帝师庄士敦与白话文运动

庄士敦自 1898 年至 1930 年作为英国高级官员在中国生活三十余年，他“通晓中国历史，熟悉中国各地风土人情，对儒墨释老都有研究，中国古诗特别欣赏。”²⁾ 他在中国的三十年，正是中国大变革的时期，西方各种思想文化涌入中国，在社会各领域都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政局也激烈动荡。庄士敦晚年著成的《紫禁城的黄昏》(1934)记录了他当年在清朝的政治枢纽耳闻目睹的一切，描写了年轻皇帝的真实面貌和当时宫廷内幕，可以对考证、核实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提供参考，本身也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庄士敦不是单纯的“皇帝的英文教师”，他认为应该给皇帝介绍当时社会青年的思想潮流。于是庄士敦向溥仪引见不同领域的国内外专家。“白话文运动”是他们在各自的著作里多次提过的关键词，胡适则是多次提过的核心人物。庄氏收藏中胡适的签名本较多，也可说明庄士敦与胡适的往来尤为频繁，关系密切。他们说：

我们谈论课外问题所占用的上课时间已经越来越多，谈论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他给我讲过英国王室的生活，各国的政体国情，大战后的列强实力，世界各地风光——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土地上的风物，中国的内战局势，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他这样称呼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的关系，……

(《我的前半生》p. 100)

我与北京的一些“新青年”和“文学改革运动”的几位领袖是相识的，其中的许多人和我同是一个国际性社团文艺会³⁾的成员。文艺会定期集会，会员在开会时经常讨论我们共同感兴趣的题目。我曾担任过一年这个学会的会长职位。继我之后，担任会长之职的就是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改革家胡适博士。我搜集了他的一些文章，介绍给了皇上阅读。还将胡适和他的同人们经常为之撰稿的一些期刊送给皇上阅读。

(《紫禁城的黄昏》p. 351-353)

我十五岁时由于听庄士敦师傅的介绍，知道了有位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庄士敦一边嘲笑他的中英合璧的“匹克尼克来江边”的诗句，一边又说：“不妨看看他写的东西，也算一种知识。”

(《我的前半生》p. 89)

通过庄士敦介绍，胡适 1922 年 5 月谒见溥仪，溥仪此时还特意提问“白话文是有甚么用⁴⁾”。可见庄士敦非常关注和了解白话文运动。而这时候徐志摩还在英国，刚转向和投入文学。关(2015)一文指出：“对徐志摩来说，翻译则是追求‘理想的白话文’的重要手段。因此他的翻译作品八成都发表在其前期。⁵⁾”毋庸置疑，庄士敦迟早会注意到白话文学新秀徐志摩。

2 徐志摩与帝师的交往

2.1 二人初步结识

故宫出版社2010年版的《紫禁城的黄昏》第442页有两张照片。一张是溥仪和印度诗人泰戈尔在故宫御花园的合影。另一张唯独该版所有⁶⁾，是在庄士敦家门前泰戈尔一行与庄士敦等共12人的合影，上面还有全程陪同的徐志摩与林徽因⁷⁾。这张照片恐怕是能够证实二人接触的最早依据。

泰戈尔是经过徐志摩的斡旋访华的，徐志摩受邀请单位讲学社的委托，负责泰戈尔到中国前的准备工作，还有他到后的全程陪同和翻译工作。泰戈尔在离开中国之前谒见溥仪，是庄士敦恳请皇上同意的。

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里回忆泰戈尔谒见溥仪的经过时还特意提及徐志摩：

泰戈尔于1924年4月应一个文学团体的邀请来到北京。这个团体中有文化名人胡适博士，有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新月派”的领军人物徐志摩，不过几年后他即因飞机失事而逝世。

（《紫禁城的黄昏》下 p. 440）

这是该书唯一提名言及徐志摩的地方，这张照片足以证明1924年春天泰戈尔来华时庄士敦与徐志摩曾接触过。庄士敦是觐见溥仪的入宫窗口，负责全程接洽工作的徐志摩需要事先跟庄士敦取得联系。但徐志摩是1922年10月留欧回国的，如前所述，庄士敦对中国文学的知识渊博，特别关注白话文运动，而且他和胡适都是一个“国际性社团文艺会”的成员，经常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根据如此的关系，认为徐志摩到了1924年才与庄士敦初次相识未免太晚。

徐志摩1922年冬天在文友会做了题为“Personal Impressions of H. G. Wells, Edward Carpenter, and Katherine Mansfield”（我对威尔斯，嘉本特和曼斯菲尔德的印象）的英文讲演。文友会就是庄士敦提过的“国际性社团文艺会⁸⁾”，而且该会是胡适创立的，庄士敦和胡适都担任过会长。

由以上史实，我们推断徐志摩与庄士敦的初步结识可以追溯至1922年冬天的讲演会。至于二人的关系，从他们的年纪和社会地位着想，与其解释他们一见面就谈得情投意合成为好朋友，还不如想像热爱西方文化的青年诗人应该以仰慕的眼光看着庄士敦。1922年冬天或许是他们的初次相遇，而1924年的泰戈尔来华就是他们进行合作并进一步了解的契机。

2.2 泰戈尔访华期间的庄士敦与徐志摩

泰戈尔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裔作家，徐志摩第一崇拜泰戈尔“不朽的人格”，他在《泰戈尔来华》中写道：“泰戈尔在世界文学中，究占如何位置，我们此时还不能定，……但有一事我们敢断言肯定的，就是他不朽的人格。他的诗歌，他的思想，他的一切，都有遭遗忘与失时

之可能，但他一生热奋的生涯所养成的人格，却是我们不易磨翳的纪念。⁹⁾”他希望中国青年“从他的伟大，和谐，美的人格里得到古印度与今印度文化的灵感”¹⁰⁾。其次，徐志摩崇拜他诗作上的“革命¹¹⁾”精神，认为泰戈尔的诗作给白话文与白话文运动“展示了新的远景”¹²⁾。徐志摩在写给朋友的信和日记《西湖记》里多次提到他的兴奋和期待。1923年7月给泰戈尔的信中说，为他充任旅伴和翻译是“莫大的殊荣”¹³⁾。他多次要求泰戈尔事先将讲稿发给他，还为他的住宿问题¹⁴⁾费心思，他在准备工作中如此高度负责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

然而，事情的进展没有他预期的那么顺利，中国的文学界就泰戈尔访华问题形成了欢迎派和反对派，双方唇枪舌剑开展激烈争论。这对徐志摩来说完全是始料不及的。虽然他不能理解那些不欢迎或反对之声，并对此很厌烦，但还是真诚地去解释并请求理解。他给胡适写信发牢骚并求助：

说起泰谷尔的事，昨天听说大学蒋校长决意不欢迎，还有吴稚晖已在预备一场澜语，攻击这不知自量的“亡国奴”。本来诗人的价值无藉于庸众的欢迎，泰谷尔的声誉也不是偶然取得的，他也忍受过种种的污蔑与诬毁，不过他此次既然好意来华，又不拿我们的钱，假如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偏见或误解，岂非使他加倍的失望，你以为是否？……我们本来想请他多游名胜，但恐天时太冷，地方又不安靖，预期甚难实现。你有甚么见解，请随时告我。

(1923年8月8日致胡适的信)

徐志摩9月10日发表《泰山日出》和《太戈尔来华》¹⁵⁾，将泰山日出与泰戈尔来华相比拟。这两篇充满着徐志摩对泰戈尔的赞美与对他来华的期待，言词确实有点儿夸张，因此也有部分专家指出这也是泰戈尔被遭到抵制的原因之一¹⁶⁾。10月，泰戈尔表示因病不能按期来华，社会上又因此有了流言飞语，徐志摩当时在杭州，他特意花了一晚上写下《太戈尔来华的确期》¹⁷⁾一文对此加以解释¹⁸⁾。徐志摩在该文里呼吁：

我们也正好利用这半年工夫来准备，听他的使命，受他的灵感。我们既然知道含糊的崇拜是不对的，我们就应得尽相当的心力去研究他的作品，了解他的思想，领会他的艺术——现在正是绝好的机会。

……认识他，了解他，预备他来时欢迎他，爱护他，那才不负他远渡万里的辛苦，那才可以免了“迎神赛会”的陋习。

在该文最后徐志摩还提议为庆祝泰戈尔生日而表演他的戏¹⁹⁾。他还呼吁人们不能“负他爱敬我们的至诚，他不惜高年跋涉的一番盛意。”²⁰⁾徐志摩乐观地相信²¹⁾，如果人们认识和理解泰戈尔，那么一定能够欢迎他。

1924年2月，也就是泰戈尔来华的两个月前，徐志摩致魏雷的信中说：“太戈尔快来中国了。

这事将轰动一时，……²²⁾”虽然流言蜚语有逐渐升温的趋势，徐志摩仍然天真乐观地抱有希望，当然他也开始有了一些担忧。

1924年3月，他把恩厚之的来电坦承地公开出来²³⁾。其目的莫过于再次让读者理解泰戈尔访华的不容易及其价值，并呼吁人们到时候真诚地爱戴他。

泰戈尔来华后，遭到一次又一次尴尬的礼遇，甚至在南京演讲时一部分学生引起骚动，使他黯然神伤。徐志摩不愿意看到泰戈尔失望，感到窘迫和无奈，愤慨和失望。

1924年5月12日，徐志摩在北京真光剧场登台讲话，宣布泰戈尔所有活动一概撤销，他将出城静养。徐志摩问：“我们也得平心的想想，老人到底有什么罪，他有什么负心，他有什么不可容赦的犯案？公道是死了吗，为什么听不见你的声音？”²⁴⁾”

庄士敦看到学界的唇枪舌剑，看到泰戈尔无奈与尴尬，看到徐志摩的挫折与失望，他也认为如果泰戈尔“未能领略到高贵的礼仪之邦的待客之道就离开中国，未免可惜。²⁵⁾”所以他恳请皇上同意接见泰戈尔。而恰好在泰戈尔访华的前一个月，胡适第二次觐见溥仪²⁶⁾，胡适和庄士敦都有机会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或许还会跟皇上提出建议。总之，庄士敦作为帝师应该借这个机会开阔青年皇帝的眼界，对失望中的泰戈尔和徐志摩来说，这也是莫大的帮助。

2.3 赠送《猛虎集》的时间和地点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猛虎集》上徐志摩的献词：“俚词一卷呈 志道先生惠存 徐志摩 北平二十年秋”（见图1）。我们推测徐志摩将《猛虎集》亲手交给庄士敦，有三个方面的理由。第一，“1931年秋天”他们确实有机会接触。第二，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情势，很难想像为赠送书籍采用邮寄的方式。第三，徐志摩签名时特意用庄士敦的雅号“志道先生”。

首先看看时间问题。《猛虎集》上的日期“二十年”应该是民国20年即1931年。《猛虎集》1931年8月新月书店出版，徐志摩给庄士敦赠书应该在该书被出版后到11月19日他因一场飞机事故而死于非命这一段时间内。这一年9月，已辞掉帝师职位回国的庄士敦，为了参加太平洋会议又来到了中国。如果是见面赠书，这就可能发生在9月到11月的两个多月之间。现在我们试将庄士敦与徐志摩这一时期的行踪对上。

《紫禁城的黄昏》的有关记载如下：

移交事宜办完后，我便马上返回英国。我在中国度过了三十年的光阴，不知何时才能重履斯土。然而颇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恰好一年之后，我又回到了中国。

……

我搭的船到达日本前几天，发生了著名的1931年9月18日的满洲事变。我一到上海，就立刻乘火车赶往天津，10月7日到达天津。皇上正在等着我，他派了一名侍从到车站接我。……我和皇上相处了两日，……。

10月8日，我离开天津去北京，见到了被逐出家门的东三省军阀张学良将军。

……我在北京期间，忠于皇帝的各阶层人士纷纷前来拜访。他们都以为我这次来中国是和东北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有关。虽然我极力否认，但他们全然不信。他们全都压抑着内心的激动与期待之情。

10月15日，我返回天津，与皇上再度会面，进一步商谈有关事情。21日，我抵达上海，出席了为期数日的太平洋会议。

……

我于11月10日到达南京，时任中国财政部长兼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得悉后，请我立刻往见。

……

11月13日，我回到上海，收到一分私人电报，获悉皇上已经离开天津去关外了。

（《紫禁城的黄昏》p. 558, 1. 18 — p. 560, 1. 10）

1931年2月，徐志摩在北京大学任英文系教授兼上海中华书局、大东书局的编辑，并且他妻子陆小曼一个人住在上海的家里，因此他北京、上海两头跑。据致陆小曼的10月1、10、22、23、29日函，这一段时间，徐志摩在北京忙于上课和应酬²⁷⁾。信中还多次提及家境，嘱咐陆小曼谨慎花钱。当时他穷得“寸步难移”的地步，虽然归心似箭，但连旅费都无法筹措，甚至想到“如有不化钱的飞机坐，立即回去。²⁸⁾”可见这时期徐志摩在私人问题上压力巨大。据11月9日信，徐志摩还在着急地等着“坐不化钱的飞机”。据《徐志摩年谱简编》²⁹⁾，他终于等不及了，11日离北京南下，于13日到达上海，显然不是坐飞机的。这是他最后一次南下，其目的就是看陆小曼³⁰⁾。徐志摩18日晚上6点访问杨杏佛不巧没见着，便留了一个条子写道：“才到奉谒，未晤为悵。顷去湘眉处，明早飞北京，虑不获见。北京闻颇恐慌，急于去看看。杏佛兄安好。志摩³¹⁾”这是徐志摩的绝笔。18日他坐火车到南京，19日上午坐邮机从南京起飞，飞机在飞往北京的中途触山失事，徐志摩遇难身亡。

从以上资料看来，徐志摩与庄士敦会面的第一个可能日期与地点是10月8日至15日于北京。如上所提，这段时间庄士敦接受了不少“忠于皇帝的各阶层人士”的来访。其中包括文学界的知己也并不意外³²⁾。第二个可能日期与地点则11月13日至18日于上海³³⁾。

其次，当时的中国政治极为混乱，天津河北一带发生暴乱，社会十分动荡。徐志摩在致郭子雄的信中提到：“我新出《猛虎集》及编诗刊已出三期。以印寄皆极慢又成愆误。今嘱书店寄奉书册，到盼付复。³⁴⁾”庄士敦这次在中国逗留时间才一个多月，并且不停留在一个地点，奔跑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在此情况下很难想像徐志摩将书藉邮寄给他。因此我们与其推测徐志摩将他的书藉邮寄给庄士敦，倒不如推断在会面之际亲手赠送的。

最后，献词所用词语的问题。徐志摩在《猛虎集》上的献词为“俚词一卷呈 志道先生惠存 徐志摩 北平 二十年秋”。他用了庄士敦的雅号“志道先生”。而胡适在《西遊記考證》、《吳敬梓年

譜》上都写上“敬呈 莊士敦先生 適”(见 1.1 (8), (9)), 吴宓在《吴宓詩集》上也写上“莊士敦先生賜政 吳宓敬贈”(见 1.1 (10))。当时比徐志摩年长而且与庄士敦比较熟悉的胡适都使用尊称。徐志摩对庄士敦有敬重、感谢, 而庄士敦也愿意让徐志摩称呼自己的雅号, 这种亲密的交情才能让徐志摩有信心地、随意地写上庄士敦的雅号。

庄士敦此次中国之行非常仓促, 不管在北京还是在上海, 他都应该特意抽空与徐志摩见面, 徐志摩将刚出版的《猛虎集》赠送给了庄士敦, 很有可能同时赠送刚出版的《诗刊》第三期(见 1-1 (5))。庄士敦跟徐志摩会面不久, 就接到他遇难身亡的消息, 他一定感到非常震惊, 回国后他写作《紫禁城的黄昏》时, 自然会特意写上他的名字。

2.4 《賀雙卿雪壓軒集》及其它

如图 2 所示, 庄氏收藏里还有《賀雙卿雪壓軒集》一本。该书是由张寿林校辑的清代女词人贺双卿诗词集, 上面竟然有徐志摩的签名:“惠來先生 志摩”。说明这本书是徐志摩送给“惠來先生”的。目前我们尚未确定“惠來先生”究竟何人, 该书怎会落到庄士敦手里。我们只知道以下两点。其一, 徐志摩 1926 年 11 月 13 日《晨报》副刊第五十二期上刊登了张寿林论文《贺双卿》, 之后张寿林又出版该诗词集, 这些都为贺双卿研究开起了先河, 之后在文学界贺双卿研究成为热门话题。其二, 徐志摩和张寿林关系很好。社会上对徐志摩的私人问题引起非议时, 他是少数对他表示“恳切慰藉”的, 徐志摩对此很感激³⁵⁾。由此可以推断, 徐志摩、“惠來先生”以及庄士敦都关注贺双卿的研究, 这本书是经过“惠來先生”最后落到庄士敦手里, 再次说明庄士敦对贺双卿等中国文学问题涉猎深广, 同时说明庄士敦、“惠來先生”、徐志摩、张寿林等人的“朋友圈”有一定程度的重合。

庄氏收藏里还有吴宓的签名本《吴宓詩集》(见 1.1 (10))。吴宓是深受英国浪漫诗人雪莱影响的诗人, 在留美期间与徐志摩相识, 很推崇徐志摩。两人之间没有往来书信留存, 能够证实其交往的资料不多。据吴宓日记, 他参加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³⁶⁾。徐志摩遇难身亡之后, 吴宓曾发表过两首哀悼徐志摩的诗³⁷⁾, 他还作为《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编辑撰哀悼文, 不料对此后胡适、杨丙辰等的笔战提供了契机, 吴宓对此感到痛苦。

3 小结

本文通过英国伦敦大学馆藏资料首次详细追踪了徐志摩与庄士敦往来的起点、终点及其经过。在该领域研究上, 较之以往主要进展有:

1. 推定徐志摩与庄士敦的结识大概在 1922 年冬天文友会举办的英文讲演会上。1924 年泰戈尔到华访问, 徐志摩在准备和接待工作中首先是期待, 然后是担忧与焦躁, 最后是愤慨与失望。而庄士敦将泰戈尔介绍给皇上, 泰戈尔离开中国之前能谒见当今皇上, 这对徐志摩

来说也是莫大的帮助。庄士敦和徐志摩的友谊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深。

2. 从二人的相识到合作过程中，胡适大概起到中间人的作用。
3. 我们认为泰戈尔访华以后，徐志摩与庄士敦的友情并没有中断。通过围绕《賀雙卿雪壓軒集》的探索，我们推定徐志摩、胡适和庄士敦的中国文人朋友圈有很大程度上的重合。
4. 由于献词所用词语和当时的社会情势等原因，我们认为1931年徐志摩是亲手将《猛虎集》交给庄士敦的，我们可以大致指定他们最后会面的日期与地点。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徐志摩与庄士敦不只有一面之交，他们的友谊源源不断地持续了十年之久。徐志摩作为留学欧美的中国文化知识精英，不仅与哈代、傅来义等人交往频繁和密切，而且也容易跟泰戈尔、庄士敦交流沟通，力图将世界文学乃至世界文化思想介绍给中国；庄士敦作为西方杰出的汉学家，不仅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而且也关注中国文化的的新思潮，也在尽力推进中西文化的交流。

注

- 1) 关于庄士敦回国后在伦敦大学的日子，我们在 Robert A. Bickers (1995) 上能够得到详情。
- 2) 见《我的前半生》p. 96。庄士敦确实对中国的各领域造诣颇甚，他的著作有《佛教徒在中国》、《威海卫狮龙共存》、《儒教与近代中国》、《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评议》、《中国戏剧》等。一般认为这些著作涉及面广，专业性高。
- 3) 该书只标注说“该会创立与1920年，到1924年就不再活动了。其成员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及英联邦其他地区、法国、荷兰和德国。”据桑兵(1999)，可以断定这文艺会就是胡适创立的“文友会”。他描述“当时各国来华人士不少，其中喜欢文学者于1919年组织了文友会，定期举行演讲等活动，有几十人参加。其成员与各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联系。胡适因此与流亡的俄国东方学家钢和泰和时任帝师的英国汉学家庄士敦(R. F. Johnston)经常来往。”
- 4) 见《我的前半生》p. 110, 1. 15。
- 5) 关光世(2015) p. 225, 1. 8。
- 6) 据该书的译后记，该版本除了原版所附照片之外，还特意增加了一百余张清宫旧藏的老照片，以便读者理解。
- 7) 据王莱茵(1989)，这张照片是他在故宫内宫藏旧照中发现的。一般认为这一张是在泰戈尔谒见皇上前后照的。
- 8) 参照注4。
- 9) 见p. 294, 1. 8。
- 10) 见《泰戈尔来华的确期》p. 344, 1. 9。
- 11) 刘介民在《类同研究的再发现》中指出徐志摩“把泰戈尔以孟加拉口语入诗与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诗人用白话写诗等同起来，认为这是一个创举，具有历史意义，所以他说泰戈尔是‘文学革命家’”。
- 12) 1923年12月27日致泰戈尔函，《徐志摩全集》第六卷p. 380, 1. 1。
- 13) 1923年7月26日致泰戈尔函，《徐志摩全集》第六卷p. 376, 1. 6。
- 14) 他在致恩厚之的信中提到，本来想借用故宫内的团城，可没有成功。他还提出宿舍方面如有要求，尽管提，他会“一片热诚来备办一切”(见1924年1月22日致恩厚之函，《徐志摩全集》第六卷p. 313, 1. 6)。
- 15) 均发表在1923年9月10日《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太戈尔号”，《太戈尔来华》(《徐志摩全集》

第一卷 p. 292)、《泰山日出》(《徐志摩全集》第一卷 p. 311)。

- 16) 鲁迅指责说就是徐志摩“捧杀”了泰戈尔。笔者认为徐志摩对泰戈尔的赞美有些过分。但这与当时特殊局面中的窘迫和焦虑也有一定的关联。
- 17) 发表在 1923 年 10 月 29 日《文学周报》第 94 期,《徐志摩全集》第一卷 p. 342。
- 18) 该文日期为十月二十一日,而徐志摩在日记《西湖记》十月二十一日写道“但昨夜却为太戈儿的事缠住了,辜负了月色,辜负了湖光,……”(《徐志摩全集》第五卷 p. 291)我们认为徐志摩二十日晚上写的就是《泰戈尔来华的确期》,而且写到半夜三更,没有时间欣赏中秋月色。
- 19) 后来亲自参加演出,成功表演《齐德拉》。
- 20) 见《泰戈尔来华的确期》,《徐志摩全集》第一卷 p. 344, 1. 12。
- 21) 笔者认为徐志摩的天真和乐观与孙宜学在《徐志摩如何“捧杀”了泰戈尔》一文里指出的“性格的悲剧”相通。他说:“徐志摩对泰戈尔受到激烈的批评当然感到非常愤怒,但他可能始终都没明白自己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是他性格的悲剧,也是其思想的悲剧。”
- 22) 见《徐志摩全集》第六卷 p. 451, 1. 15, 1924 年 2 月 21 日致魏雷函。
- 23) 《泰戈尔来信》载 1923 年 3 月 7 日《晨报副刊》,《徐志摩全集》第一卷 p. 424。
- 24) 见《徐志摩全集》第一卷 p. 444, 1. 19,《泰戈尔》。
- 25) 见《紫禁城的黄昏》p. 440, 1. 24。
- 26) 据《紫禁城的黄昏》p. 354, 1. 12, 1924 年 3 月 27 日,胡适第二次进宫觐见皇上。笔者认为在泰戈尔访华问题上,胡适是背后帮助徐志摩的,因此见到溥仪或庄士敦不可能不提泰戈尔。
- 27) 1931 年 10 月 1 日致陆小曼函,《徐志摩全集》第六卷 p. 180, 1. 6。
- 28) 1931 年 10 月 29 日致陆小曼函,《徐志摩全集》第六卷 p. 186, 1. 22。
- 29) 《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 现代卷 66 徐志摩研究资料》p. 50。
- 30) 正好此时出卖他上海的住宅问题也到了最后能否签字的紧要关头,南下也有生意上的需要。但他在信上说:“我此行专为看你:生意能成固好,否则我也顾不得。”可见这时候徐志摩想妻子胜过生意。
- 31) 1931 年 11 月 18 日致扬杏佛函,《徐志摩全集》第六卷 p. 70。
- 32) 至于他们是否“忠于皇帝”,那该另当别论。
- 33) 很巧遇的是两人均在 11 月 13 日抵达上海。
- 34) 11 月 1 日致郭子雄函,《徐志摩全集》第六卷 p. 397。
- 35) 1925 年 × 月 × 日致张寿林函《徐志摩全集》第六卷 p. 51。这时徐志摩由于和陆小曼的恋情受到各方冷遇的。他在信上感谢朋友的恳切慰藉。
- 36) 《徐志摩与雪莱》,原载《宇宙风》1936 年 3 月 1 日第十二期,《徐志摩评说八十年》p. 161。
- 37) 刊登在《大公报·文学副刊》,《挽徐志摩君》1931 年 12 月 14 日,《再挽徐志摩君》1934 年。

笔者曾两次访问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图书馆,在图书管理员谢惠兴(Ms Wai Hing Tse)老师的帮助下收集了包括本文所提到的签名本在内的一些资料。本文所介绍的照片(图 1 和图 2)是得到允许后进行拍摄的。特此鸣谢。

本文作为京都产业大学综合学术研究所的研究支援项目(研究题目为“形成于清末民国初期的汉语白话文体中欧化现象的实证研究”)之一,得到该研究所的资助。

参考文献

- 徐志摩著 韩石山编 2005《徐志摩全集》第一卷·散文 天津人民出版社
 徐志摩著 韩石山编 2005《徐志摩全集》第五卷·小说 戏剧 日记 天津人民出版社
 徐志摩著 韩石山编 2005《徐志摩全集》第六卷·书信 天津人民出版社
 関光世 2015「徐志摩の翻訳作品に見られる“被”構文と欧化」,『中国語学研究開篇』34号 p. 223-231 好

文出版

- 桑 兵 1999《胡适与国际汉学界》，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 p. 49-68
- 徐志摩著 虞坤林整理 2003《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韩石山·伍渔编 2008《徐志摩评说八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
- R. F. Johnston 著 惠春琳 李亚敏 陈晓东 付瑞红 译 2010《紫禁城的黄昏》故宫出版社
- 爱新觉罗·溥仪著 2007《我的前半生（全本）》群众出版社
- 赵 毅 衡 2013《对岸的诱惑 中西文化交流记》四川出版集团
- 刘 介 民 2002《类同研究的再发现 徐志摩在中西文化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孙 宜 学 2005《徐志摩如何“捧杀”了泰戈尔》，载《书屋》2005年第9期 书屋杂志社
- 邵华强编 2011《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 现代卷 66 徐志摩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
- 汪 莱 茵 1989《溥仪和泰戈尔》，载《紫禁城》1989年第3期 p. 5-7
- Robert A. Bickers 1995 "Coolie Work": Sir Reginald Johnston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1931-1937,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Third Series, Vol. 5, No. 3 (Nov., 1995)*, p. 385-401

徐志摩と帝師ジョンストン

——ジョンストンコレクションに見られる『猛虎集』を端緒として——

関 光 世

要 旨

本論は、英国ロンドン大学東洋アフリカ研究学院（SOAS）のジョンストンコレクションに残された『猛虎集』を手がかりに、徐志摩（1897-1931）と清朝最後の皇帝愛新覺羅溥儀（1906-1967）の帝師を務めたレジナルド・フレミング・ジョンストン（1874-1938）との交流について、可能な限り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この『猛虎集』初版本には、徐志摩のサインが残されているとの記録がある。しかし、筆者の現地調査によって未公表の献辞が確認できており、その文言は、二人の交流が従来知られているよりも長く、深いものであることを示唆している。徐志摩とハーディ（1840-1928）やフライ（1866-1934）らとの交流はよく知られているが、留学から帰国した後の西洋人との交流については、ほとんど取り上げられていない。

本論は、献辞の文言や日付などの情報を手がかりに、コレクションに残された他の中国知識人の書籍、ジョンストンの著書『紫禁城の黄昏』、溥儀の自伝『わが半生』、徐志摩の日記や書簡など関係資料を参照し、二人の交流の起点と終点及びその過程について仮説による叙述を試み、以下の点を明らかにした。

1. 徐志摩とジョンストンの出会いは、1924年のタゴール（1861-1941）訪中時よりも早い1922年冬、つまり徐志摩の帰国直後であった可能性が高く、タゴール訪中は二人の交流が一層深まる契機となったに過ぎない。
2. 二人の出会いと交流において、胡適は仲介者として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た。
3. 『賀雙卿雪壓軒集』上のサインは、二人の交流が長期間継続しただけでなく、彼らの交友関係が、中国文学界においては相当程度共通していたことを物語っている。
4. 献辞の文言や当時の社会情勢から、『猛虎集』初版本は、出版から徐志摩が事故死するまでの短い期間に直接手渡されたと判断し、その時期と場所を概ね特定した。

以上を総合すると、徐志摩とジョンストンの交流は、徐志摩が留学から帰国した直後に始まり、タゴールの皇帝謁見を機に深まり、1931年、互いに極めて多忙な中で最後の対面を果たすまで続いたと結論づけることができる。

本論は、ジョンストンコレクションに見られるジョンストンと徐志摩及び胡適ら中国の知識人との交流の詳細を初めて解明し、従来ほとんど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のなかった徐志摩とジョンストンの交流の起点と終点、及びその過程を明らかにしており、徐志摩の西洋理解、ひいては1920年代における中国と西洋の文化交流について、その一端を理解する上で価値あるもの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Johnston Collection, 徐志摩, R.F. Johnston, 『猛虎集』, 中国と西洋の文化交流

